

“去鲁迅化”的说法未免夸大其词

↓“去鲁迅化”是间发性爆发的癔症 中国青年报 8月13日 作者 胡印斌

【中国青年报一评】

人民教育出版社新版的语文教材中,鲁迅的作品明显减少,《药》、《为了忘却的纪念》等作品均不见,保留下来的只有《拿来主义》、《祝福》和《纪念刘和珍君》3篇。一时间,陪伴几代人成长的鲁迅作品,竟然在校园里面面临尴尬的境地,是去是留,争议不断。(成都商报 8月12日)

这两天,鲁迅作品是不是晦涩压抑、中学语文教材到底要放几篇鲁迅文章的旧话题,又波澜泛起,网络热议。类似讨论其实一点都不新鲜,近年几乎隔一阵儿就爆发一次。说辞无非是“晦涩”、“压抑”,或许还可以加上一个“偏狭”。可能“偏狭”更接近于对人的评价,往往在讨论作品时被有意忽略了。坊间很多讨论似乎有意将作家为人和作品文本区分开来,可事实上能分得开吗?

作为一名曾经的中学语文老师,我觉得这样的讨论不值得认真辩驳。这些年来,“去鲁迅化”文化癔症频频发生,本身就预示着我们的教育或者说教化出了一些问题。

首先,现行教材对鲁迅的解读,依然没有走出窄化误区,依然将其简单地政治化、

革命化乃至意识形态化。在这种泛政治化倾向影响下,鲁迅作品的文本价值被严重遮蔽,很少有教师引导学生经由文本进入鲁迅的世界。所谓循循善诱也不过是一点一点将诸如“横眉冷对”、“不妥协”之类的标签形象化,一个无比丰富有爱的生命个体被神圣化和伟岸化起来。

关于教材中鲁迅作品的讨论也仅限于篇目增删,至今没有看到回归文本、回归文学的呼吁。如此做法,既有悖鲁迅本意,也是社会教育的悲哀。其实,很早以前就有过共识,即问题焦点并不在于鲁迅作品进不进教材,有多少篇目进教材,而是到底应该用什么方式去接近、学习和评价它。要说隐晦艰涩,大多数国学经典不更艰涩?可现在社会公众已对重温国学经典有了很积极的评价。压抑也不是借口,鲁迅置身于一个动荡的变革

时代,作品头绪繁杂、背景复杂也是事实,然而,惟其如此才是一个时代的真实记录,哪里能为了阅读愉悦,而要求鲁迅作品也轻松起来呢。

其次,这一争论也暴露出我们在经典教育上的缺失,我们还没建构起一条社会大众进入经典的有效通道。现实生活中,我们给太多白胡子老头滥发大师帽子,却往往又大大咧咧地抱怨真正的大师、真正的经典太少。我们只震撼于大师头上虚妄的光辉,却往往不愿意、不能够走近大师、理解经典。我们也多满足于对大师的祭拜和悼念,以附骥尾为荣。

经典的修习能直接进入人的心灵、塑造人的心灵。经历了教材“随风倒”的人们终究会意识到,一个民族一定要有一些真正的经典存留下来。鲁迅作品是不是这样的经典?我想,经历了大半个世纪众多学人的淘洗、锤炼,这一点当

不应存疑。现在需矫正的,不是要不要而是怎么样去解读鲁迅作品。

【现代快报再评】

调整和减少鲁迅作品篇目,怎么就是“去鲁迅化”?这种文学化、夸张的口吻,实在不可取。“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与其言辞激烈不如摆事实讲道理。鲁迅还是鲁迅,教育机构出于教学的目的,减少两篇鲁迅作品,并不意味着降低对鲁迅的评价。什么叫“癔症”?歇斯底里是也,这不是骂人吗?鲁迅也有激愤之辞,有“叭儿狗”、“落水狗”之类比喻,但他也说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教材要与时俱进,增加中外经典和当代精品,有些传统篇目必然要减少,这有什么难理解的?退一步说,就算是当代青少年少读点鲁迅,未必就是对鲁迅的不敬。

善款流入财政 民间慈善如何成长

↓政府代花爱心钱要有本明白账 华商报 8月13日 作者 潘文华

为汶川地震所捐赠的款物总数创纪录地达到了767亿元。清华大学一支团队为期半年的调研发现:极可能80%左右流入了政府的财政专户,变成了政府的“额外税收”,由政府部门统筹用于灾区。(中国青年报 8月12日)

【华商报一评】

按照常理,抗震救灾,社会有社会的爱心和力量,政府有政府的爱心和责任。而现在的情况是,各类基金会的救灾项目最终也多由政府执行,有的省份对口援建资金竟有半数来自捐款。这种在性质上难以分清政府与民间救灾援助的行为,很难彰显社会捐赠的作用,很难让捐助者看清他们爱心浇灌出的花朵。井喷式的捐赠热潮,遭遇模模糊糊的捐助效果,这实在不利于慰藉那一份份可贵的社会热情。

因此,政府代花爱心钱应花得明明白白。地方政府的各项救灾投入资金,有多少是财政拨款,有多少是爱心钱,要给公众说清楚。各种援建项目,有多少资金来自政府财政,又有多少资金来自社会捐款,需要明确地区分并公布。各地社会捐款的使用情况应当受到可信的监督和审计,最好有一个全国汇总的统一公布,并欢迎民间力量进行审计和核查。

且别说了从结果上鼓励社会爱心的进一步发扬,政府代花社会的钱,本来也该有本明白账。

【现代快报再评】

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民间捐赠80%左右流入了政府的财政专户,变成了政府的“额外税收”,都是令人震惊的。政府花钱效率低,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过去我们不信这个“邪”,搞了计划经济,今天还有大量国企和政府项目,实践反复证明不信不行。看看如今的国家机关“三公”消费如何居高难下,垄断国企的工资福利如何大大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就使人对政府花钱不能不心存戒备。何况,政府开支信息公开至今千呼万唤不实行,连预算公开都不干,怎能取信于人?灾区政府工作人员并不会因为身在灾区,就都变得高尚起来。

说“我国民间组织还比较弱小,执行力还有待提高,这笔庞大的捐赠主要由政府执掌统一使用,也属不得已之举”,我不赞成。民间组织的执行力不可一概而论,也有很规范很有经验的,只是没有得到授权。再说,这“不得已”又是怎样造成的?政府是限制还是鼓励民间慈善?如果是限制态度岂不是在为自己垄断慈善事业找理由?社会发展需要民间参与,不能由政府包办,这是文明国家的通行思路。

反荤段子或许是为了“精编简政”

↓480场“反荤段子会”也是个荤段子 新华网 8月11日 作者 宋桂芳

【新华网一评】

日前,河北深泽县纪委发出通知,严禁利用手机编辑、留存、传播低俗信息,违者将被追究责任,其单位领导也将被追究连带责任,特别典型的还要公开曝光。从7月10日开始,深泽在全县党员中开展专题讨论活动,目前已召开专题讨论会480多个。(人民日报 8月10日)

面对这一个月里汹涌而至的480场“反荤大会”,我只能作出如下推断:一是当地官员群体中的手机短信已到“无荤不欢”的地步,严重影响其正常的工作生活,不整反荤段子,工作没法开展,因此,其他地方只要一纸公文就能警醒的事情,在当地必须化为铺天盖地的会议才行;二是荤段子的严重性远超出金融危机,也远超出当下的民生难题,更是比反腐倡廉等工作难度要大得多,必须集中火力,专题讨论,以绝后“荤”。

批评归批评,我还是忍不住叹服于当地职能部门细致的工作。荤段子也好,素段子也罢,都是人家手机里的事情,“编辑、留存、传播”是怎么被领导们洞悉的呢?据说还要严

查,还要追究连带责任,还要公开曝光,力度不可谓不大,反低俗的决心不可谓不强,但是,我还是想不明白,接下来,当地的反荤领导小组怎么查?是挨个搜查官员们的手机呢,还是像《窃听风云》里那样装个短信窃听器?当然,这些技术倒不是什么难事,难的是程序正义与否——须知,即便是警察搜短信,还得有正当理由呢。

荤段子不比低俗网站,不会跳出来让观众观赏(当然,以荤段子恶意骚扰别人的另论),危害不了公众。只要保管得当,估计就和个人硬盘里的私密一样,顶多算个道德问题,何况况行政权力乎?身为公职人员,私权固然要让渡出一部分。但是,手机里的短信,恐怕还属于隐私保护的领域,即便是领导上司,也不能以查荤段子这个不咸不淡的理由胡乱翻

看。由此看来,整治荤段子,不仅会议上解决不了,会后的严惩也徒具观赏意义。

由此观之,这480场“反荤段子会”就成了个不折不扣的荤段子。开会是需要成本的,吃饭拼酒,抽烟喝茶,会场上的空调灯盏,耗费的都是纳税人的钱——即便这些都忽略不计吧,因开“反荤大会”而耽搁的工作时间,起码可以做点更有意义的事情。而且,这些会议难免让民众浮想联翩:当地一些官员“荤段子”到了何种地步,竟然需要一个月480场“反荤段子会”来拯救?荤段子是该治理,但显然不是“会议依赖症”所能解决的问题。

【现代快报再评】

我相信当地党政领导下这么大的决心搞这么大个整治运动,必有他们的理由,一

定是到了“非……不可”的地步,而不是大脑发了昏。为什么会到这个地步呢?桌面上的理由是“反荤”,至于此外还有什么深层理由,外人不好乱猜度了。

我们知道,现在很多段子包括讽刺现实的段子,并不是文化程度较低又无钱无闲的打工者编的,很多都出自机关工作人员之手。而机关工作人员编制之滥往往超出我们想象,近日曝光说湖南溆浦林业局有1118人,交通局有1868人。这么多人不编段子怎么打发日子?这么多机关人员要摆平也很难,凭什么他升官我不升?而且很多段子是针对领导发泄不平的,这也很不利于“维稳”呀。

中国的奇事怪事层出不穷,谁说我们缺少创意?

“慈善大跃进”来着不善

↓靠道德跃进打造不出慈善城市 潇湘晨报 8月12日 作者 周东飞

【潇湘晨报一评】

近日,河南省荥阳市出台措施,要在全市设立1000多个慈善组织,推举出5000多个慈善大使,荥阳市委书记杨福平宣布,要将荥阳打造成“慈善城市”。(河南商报 8月11日)

慈善说到底还是道德范畴的东西,道德一贯从属于人的内心,有没有慈悲之心,为不为善行义举,不能靠外在的强制去解决问题。中国古人把道德的教化任务交由音乐和诗歌去担当,或者顶多寄望于统治阶层的以身作则,从来不以强力可以让民众变得道德起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卓越的见识。2008年汶川大地震引发了慈善井喷,根本原因在于灾难震撼了民众的内心,悲悯唤醒了民间的力量。荥阳今年筹集的善款不到2008年的1/8,这样的落差原本十分正常,但它却成为荥阳发动一次道德跃进的理据。

历史已经证明,所谓“大跃进”带来的不过是一次生产力的倒退。失去了必要的基础,道德跃进的结局同样不免成为一场闹剧。行政的强制可以催生大广场、大马路,却

无法真正提升人们的慈善意识和道德水平。内心的改变要以最基本的同意和共识为前提,而大张旗鼓急风骤雨的权利介入模式却往往与内心所需要的方向相反,权力所热衷和谄熟的往往是纸面的数字和表面的排场。如同河北深泽为治理黄段子一个月内召开480个座谈会一样,荥阳为打造“慈善城市”设立1000个慈善组织,也不过是一种大家都玩熟了的游戏。当村里、厂里无处不充斥着“慈善组织”的时候,也正是到处都找不到真正慈善的时候。

或许我们没有必要去怀疑荥阳打造“慈善城市”的良好动机,让社会更加公平,让困难群体享受更多的阳光,这些善意放到哪里都同样会让人感动。但是,现代政治理念告诉我们,行政权力必须承认自己的有限性。既然它无法做到万能,为了实现同样的目的,选择正确的合适的途径,

就显得尤为重要。仅就财富分配而言,实现社会公平的路径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是工资收入的分配,第二层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第三层是慈善事业的补充。工资收入的分配主要靠市场来调节,慈善事业主要靠社会来主导,政府的真正要务在于动用公共财政完善社保体系,使那些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的社会成员得到基本的公平保障。

荥阳方面动用大量的行政资源去从事原本不属于自己的“专业”,对于慈善而言是越俎代庖,对于社会保障来说又未必不是舍本逐末。既然慈善的核心是道德,适合它的只能是社会机制,政府理应将这种市场和权力都无能为力的工作交还给社会,让慈善事业真正回归民间。只有民间主导的慈善,才能真正摆脱政绩化思维和利益化思维的重重羁绊,回归到“从心出发,求得心安”的真正道德境界。

“慈善城市”未始不是一种美好梦想,关键是这项事关良心的大业不应由权力来推动,不应由政府来包办,不应通过表面化的道德跃进方式来实现。什么时候慈善事业真正成为社会自治的一部分,真正成为公民自觉的一部分,什么时候“慈善城市”才是一个可实现梦想。

【现代快报再评】

政府出面为打造“慈善城市”欲设立1000个慈善组织,这个举措本身就“来者不善”:一是目的非常功利,为树“城市形象”捞地方官政绩,古人叫“有心为善”即“伪善”,属于“虽善不赏”的范畴,不值得赞美;二是手段恶劣,属于50年前“大跃进”年代的“强迫命令”、“共产风”老谱。

“慈善”的“慈”基于“心”,属于道德感,发自内心的,违背人们意愿的做法不可持续。